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一副质地细腻、制作精良的皮裹腿，这副皮裹腿经过了漫长的战争岁月洗礼，却依然完好，可见主人对它非常珍惜。这是1927年毛泽东初上井冈山时送给地方农民自卫军领导人袁文才的见面礼，它凝结了毛泽东与袁文才浓浓的革命友情，也见证了井冈山根据地建设前期那段艰苦而又充满希望的岁月。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经艰苦转战，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改编，将已不足千人的起义部队由原来的1个师编为1个团——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这次改编淘汰了不坚定分子，在部队中建立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初步基础。改编后，考虑到更好地建立落脚点，毛泽东提出要得到地方农民武装的支持，给袁文才及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写了信，派人送到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

袁文才与王佐是当时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袁文才部驻扎茅坪，王佐部驻扎在茨坪和大小五井，两人在大革命时期都受过革命风暴的洗礼。1926年，袁文才担任了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同年在宁冈县县长、共产党员龙超清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也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后两人又任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就会事半功倍。

1927年10月初，毛泽东在三湾接待了前来接头的龙超清和袁文才的代表陈嘉平，陈嘉平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讲课，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有一定的了解。

初上井冈山，毛泽东送给袁文才见面礼

毛泽东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来意，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一道展开革命斗争。龙超清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以先到离此地30里的古城。很快，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进至宁冈古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宁冈县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初步总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着重讨论了“安家”和开展游击活动的问题。会议进一步了解了井冈山地区情况，确定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采取团结、改造方针，希望能尽快在茅坪建立医院和后方留守处。会后，通过永新、宁冈的共产党组织牵线，前委与袁文才取得联系。

10月6日，毛泽东带领少数随员到大仓村会见了袁文才，为其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发展前途，说明了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意义，鼓励他扩大和巩固部队，坚持革命斗争，并决定送出100支步枪。在交谈中，袁文才心中的疑虑逐渐消失，更多的是对毛泽东的认同和敬佩，当即决定拿出几百块银元赠送工农革命军，并表示要积极帮助工农革命军。为感谢袁



毛泽东送给袁文才的皮裹腿

文才的帮助，毛泽东送了一副皮裹腿给袁文才以便其骑马用。10月16日，应袁文才要求，从位于井冈山西麓酃县（编者注：1994年改名为炎陵县）水口镇的工农革命军第1团团部，派党员干部到茅坪袁文才部帮助进行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上井冈山后，毛泽东送了王佐部队70支枪，后来又派何长工到其部队担任党代表，王佐也资助工农革命军500担稻谷和一些银元。毛泽东还多次与二人谈心，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水平。在毛泽东和工

农革命军的帮助下，袁王两支部队在政治、军事、组织方面都逐渐得到改造。

10月下旬，毛泽东率团部、第3营等部到达江西省遂川县大汾镇，在23日清晨突然遭到了遂川地方反动武装“靖卫团”的袭击，第3营与团部失去联系。在危急情况下，毛泽东率部向井冈山转移。不久，前往茶陵的第1营两个连也转到井冈山归建。另一边，第3营与团部失去联系后，沿罗霄山脉南下，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

义军余部取得了联系。此时，国民党军阀内部矛盾激化、井冈山地区敌人兵力空虚。毛泽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地区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分兵发动群众，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创建革命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部队。工农革命军首先在边界各县进行打倒土豪劣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建立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11月，工农革命军占领茶陵县城，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2月上旬，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进剿”，在新城全歼江西国民党军第9军第27师第79营和宁冈县“靖卫团”，解放了宁冈全境。随后，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北部和永新、酃县、茶陵各一部，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工农兵政府和赤卫队、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武装和组织。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立。

在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根据斗争的需要，明确规定了部队的任务和纪律；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宣传革命军的政

治主张和宗旨；开展分田斗争等。同时，着重抓了三项工作，其中两项就是改编农民武装和建立群众武装。经团结、教育、改造，1928年2月，袁文才和王佐率领的地方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团，袁文才任团长兼第1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2营营长，何长工任党代表。此外还建立了群众武装。先后组建了茶陵、遂川两县赤卫队，拔枪给永新、莲花、酃县的共产党组织筹建赤卫队。这些工作促进了工农革命军和群众武装的发展，有效地补充了正规军兵员，为在井冈山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促成了毛泽东和袁文才深厚的革命友情。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起义农民军，在宁冈砵市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袁文才所在的第2团被编为红4军第11师第32团，袁文才任团长。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袁文才率部参加了新城、龙源口、黄洋界等战斗，曾当选为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4军军委委员、红4军参谋长等职，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供稿）



解放华北的最后一战 太原战役：

□王倩

太原战役，是解放山西全省也是解放华北的最后一战，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城市攻坚战。从1948年10月5日至1949年4月24日，历时6个多月，全歼国民党阎锡山部及地方保安团13.5万余人。它的胜利，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华北的最后堡垒，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长达38年的统治，华北全境随之解放。

首战城郊，出师告捷

1948年7月，晋中战役后，阎锡山率残部退守太原，妄图依托险要地形和坚固城池负隅顽抗，待机再起。为夺取太原，消灭阎锡山集团，7月16日，中央军委命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统一指挥该兵团及晋绥军区第七纵队、晋中军区等部共17个旅8万余人，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敌人”的战略方针，于10月18日发起太原战役，争取3个月内攻克“固若金汤”的太原城。

正当我军靠近太原城郊，积极准备之时，阎锡山部为破坏我军战备准备，抢粮抓丁，实行所谓“秋季护征计划”。于10月1日以7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沿汾河以东，同蒲路以西向南进犯。至3日，敌军已攻占小店、南坪、仇家堡一线，并继续向狄

村、西温庄等地发动猛烈进攻，以巩固武宿机场。徐向前审时度势，决心乘敌军脱离防御阵地之际，提前发动太原战役，以运动战歼敌有生力量。10月5日拂晓，第八、第十三纵队迅速由南向北出击，分别包围小店、南黑窑之敌，第十五纵队由东向西直插武宿、岗头一线，第七纵队和晋中军区第五旅东渡汾河，直插小店以北，以东西夹击之势切断敌军退路，并阻击敌之援军。经一日激战，重创敌军。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获悉后致电徐向前：“歼敌两师甚慰”，“你们现有良好机会可以全歼南面及东面之敌，得手后敌必震动，望你们乘胜扩张，逐一全歼外围之敌，占领一切机场”。根据军委的指示，徐向前率部乘胜追击，继续扩大战果。战至16日，我军占领城南武宿机场，控制城北新城机场，断敌空援。并攻占石咀子、凤阁梁等重要据点。突破太原城南、北地区第一道防线。歼敌2个师、3个团又7个营。共毙伤俘敌军1.2万余人，我军首战告捷。

夺取东山，围困孤城

初战获胜后，我军决定乘胜追击，夺取东山要塞，为攻城创造有利条件。东山是太原的咽喉，是解放太原必争之地。10月15日，东山争夺战打响。经过两日激战，我军顺利攻克榆林坪、牛驼寨、南坪头、千家坟、石咀子等据点，歼敌一部。战至18日，攻占大、小北尖、石儿梁、道巴沟，并控制城北新城机场，切断了东山与太原之间的联系。至此，我军基本攻占以羊山要塞为主的山东阵地。但敌军不甘失败，多次向我军发起反攻。21日敌以3个团的兵力，集中火力向我军发起攻击，我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牛驼寨等地。

为争取战役主动，我军调整作战部署，减少正面冲突，集中兵力攻打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等东山四大要点，随后从东面攻城。10月26日，我军发起总攻，四大要点争夺战全面展开。这场战斗空前激烈，鏖战17个昼夜。敌我双方主力部队均先后投入战斗。我军投入兵力27个团，敌军出动6个师。双方参战的火炮多达800余门。经过反复争夺与拉锯，11月13日，我军控制四大要点，东山战斗胜利结束。此役歼敌1万余，我军亦伤亡8500人。与此同时，晋中军区部队也英勇作战，先后攻占青龙镇、郭家窑、中社、南堰、许坦等地，太原城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城。至此，太原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为配合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弃城逃窜，一举歼灭平津之敌，中央军委致电徐向前，“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根据军委指示，自12月1日起，以一部

兵力在太原东、北、西三面先后占领松树坡、苏村、关口、化七头、赵家山等地，并全面控制城西、城北的机场，断敌空援，将其封锁在太原城内。随即，我军对敌展开政治攻势，以战场喊话、散发传单、动员敌军投诚等方式瓦解敌军。至1949年3月底，瓦解敌军1.2万余人。

千军万马，会攻太原

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太原守军陷入孤立无援之地，阎锡山见大势已去，于2月15日逃往南京。此时太原城内尚有10万余守军拼死抵抗。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解放太原迫在眉睫，遂调第19、第20兵团（原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以及第四野战军炮兵1师支援太原前线，与第18兵团（原华北军区第1兵团）等部会攻太原。我军决定以分割包围的战术，先将敌之主力歼于城外，而后从四面八方攻城，全歼守敌。

1949年4月20日，我军分十路向太原发起总攻。各部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敌之各方防守，相继占领城北皇后院、七府坟、新城、芮城、丈子头，城南杨家堡、老军营、西寇村、大盘营，城东剪子湾、大把沟、大东关，城西南屯、新上庄、大小王村等地。战至22日，攻克敌之“生命要塞”双塔寺、黄家坟。至此，我军全部攻占外围据点，歼敌12个师，兵临太原城下。为减轻伤亡，我军向太原余部发出劝降通牒，孙楚、王靖国等人誓死不降。我军遂于24日凌晨，在1300余门火炮的支援下，对太原守军发动总攻。第20兵团首先突破城垣，第18、第19兵团也相继攻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见我军势不可挡，敌军纷纷缴械投降。战至9时30分，我军占领太原“蛰靖”公署和国民党省政府，至10时，全歼太原守军，太原宣告解放。此役共歼敌军13万余人，缴获大炮3400余门、枪支3.2万余支和大量军用物资，并生俘敌军第15兵团司令孙楚、第10兵团司令王靖国和日本顾问今村、岩田等，特务头子梁化之、徐端等集体自杀。

太原战役的胜利，使阎锡山统治38年之久的“反共模范堡垒”烟消云散。太原的解放拔除了国民党在华北残留的最大据点，大同、安阳、新乡随之解放。至此，华北全境宣告完全解放，华北再无战事。



（上接1版） 学思践悟“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

“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充分彰显了人民领袖一以贯之的为民情怀、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集中展现了人民群众伟大实践同人民领袖伟大思想、伟大情怀相互激荡形成的凝聚力和创造力，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从中追溯思想之源、真理之光，感悟理论之花、实践之果，进一步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学思践悟蕴含其中的政治担当。“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通过下访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本世纪初，全国各省信访量普遍呈现上升趋势，浙江作为市场经济先发省份，各类矛盾问题暴露更多。在此背景下，浙江省委决定在全省实行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制度，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第一次下访就选择到情况最复杂、矛盾最尖锐的浦江县，带头挑最重的担子，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担当。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强化使命意识和政治担当，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

学思践悟蕴含其中的为民情怀。“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形象地比喻道，“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强调衡量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看你为人民群众做了多少好事，办了多少实事，解了多少难题。我们要深刻领悟这种真挚的为民情怀，更加自觉地站稳人民立场，用心用情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学思践悟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为浙江在复杂多变发展形势

下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找准了具有优势特点的方法路径。从中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思维方法的深厚涵养和娴熟运用。例如，“领导多下去、群众少上来”、把问题隐患化解在基层等要求，蕴含着问题导向、法治思维、创新思维，是运用两点论、重点论、优势论的典范。我们要深刻领会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思维方法，不断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和防范化解风险本领，不断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学思践悟蕴含其中的务实作风。“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通过摸透情况、找准症结、解决难题，做到了眼睛向下、脚步向下，扑下身子、沉到一线，钻进“矛盾窝”“群众堆”里，实现变上访为下访、变被动为主动、变“公文转着办”为“就地马上办”、变信访拐弯办为领导直接办，有力解决了信访处理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让一些信访积案“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推动转变干部作风，提升干部解决问题能力。我们要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务实作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入基层、沉到一线，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持续放大“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的整体效应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有着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远战略考量。要深入挖掘其在加强基层治理中的重大实践价值，持续放大整体效应，与“枫桥经验”同步推进，把干部下沉服务与强化群众自治活力结合起来，形成互为补充、相互贯通的闭环体系，进一步推动完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格局。

突出治理理念的现代化。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传承弘扬“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经验，首先要贯彻现代治理理念，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要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推动党的组织向基层延伸、党的工作向群众覆盖、党的力量向一线聚焦，确保基层治理的政治方向永不偏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真正让人民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最广

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坚持“全周期管理”，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时间、空间和层级再造，加强全程治理、协同治理、源头治理，形成系统、协调、完备的治理体系。坚持多元共治，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创新完善鼓励多方参与社会治理的政策体系，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完善群众参与机制，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突出治理方式的法治化。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传承弘扬“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经验，要以法治手段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难点问题，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的良法善治根基。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促进和谐，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持续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落到实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努力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

突出治理手段的智能化。科技进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强大推动力。传承弘扬“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经验，以数字化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善于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起来，更好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拓展数字化手段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应用，通过现代科技推进社会沟通、改进管理服务，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特别是打造统一规范、运行高效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平台，打破现有条块分割的数据鸿沟，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机制。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加强网上信访主渠道建设，建立完善人民建议征集制度，进一步畅通民意收集渠道，将群众诉求解决问题产生之前。大力加强干部数字化能力培养，强化数字化思维，提高数字治理素养，不断提升数字治理能力。

（作者系浙江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